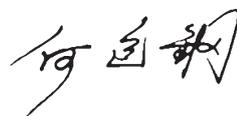


建構、動員和爭奪

——全球南方話語的批判性審視



一 引言

2024年10月24日，在俄羅斯喀山舉行的金磚國家(BRICS)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描述為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誌和人類文明進程中史無前例的壯舉。在講話中，他將金磚國家定位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陣」^①。這一被認為正在發生的崛起促使美國戰略家重新評估全球南方在塑造全球秩序中的作用，從而推動美國政府加大與這些國家的接觸力度。

儘管中美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政治立場和知識體系各不相同，但他們往往都從大國競爭的視角來理解全球南方。美國記者舒曼(Michael Schuman)認為，中方的戰略意圖是在全球南方內部打造一個聯盟，以對抗美國主導的全球聯盟體系，同時推進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利益。舒曼指出，中方試圖削弱美國主導的「以規則為基礎」(rules-based)的國際秩序，構建由中國主導的替代秩序，該秩序建立在非自由主義政治原則之上，旨在侵蝕美國影響力，並通過國際組織和論壇重塑全球治理。這一戰略願景提升了全球南方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金磚國家的擴展正是為了吸納可能支持其反美議程的國家，使金磚國家組織成為七國集團(G7)等受美國影響的國際組織的替代選擇^②。舒曼的解讀很有代表性，反映了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戰略性地使用「全球南方」一詞的回應。我也曾在一次會議中聽到澳大利亞一位部長對全球南方崛起的擔憂。鑒於此，本文將集中討論舒曼的一些主要觀點。我認為舒曼因「新冷戰」的需要過度誤讀了中國的戰略意圖。這種誤讀會進一步加深西方某些國家對中國的戰略誤判，加劇地域政治的衝突。通過對全球南方的基本假設的批判性分析，我們會發現，即使中國有着對全球南方的領導意圖，但是這個意圖本身存在不少問題，在實踐中更難成功。

儘管中國學者強調，全球南方不應被武器化或成為中美競爭的新戰場，但中國近年來愈發利用全球南方來對沖美國的「脫鉤」戰略，國際地緣政治的動態再次表現為「南北橫溝」^③。《環球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全球南方應當首先實現內部團結，並與全球北方國家合作，共同應對更廣泛的全球性挑戰。然而，該文章也隱晦地承認，根本性的問題依然存在：誰將主導全球秩序的變革^④？

從大國競爭的視角來理解全球南方，一般共有幾個關鍵假設：第一，世界可以被清晰地劃分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兩個主要陣營；第二，美國和中國正競爭領導或爭取全球南方國家，以實現各自的戰略目標；第三，全球南方是一個正在重塑世界秩序的新地緣政治力量；第四，全球南方的集體認同是由其共同的西方殖民歷史塑造的，這一認同成為政治動員的基礎，而中國正試圖利用這一點來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第五，全球南方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行動者，更多地被視為中美戰略博弈的對象，而非獨立的決策者。

本文對全球南方話語中的上述基本假設進行批判性審視，通過對該概念的話語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挑戰了傳統地緣政治敘事。主流地緣政治學長期以來以西方為中心，傾向於將全球南方描繪為受外部影響的被動接受者，或是大國競爭的戰場。這種主流分析框架可能會過度簡化全球南方國家的能動性和戰略槓桿作用，而忽視了它們在塑造全球秩序過程中的多元利益和獨立戰略。本文則試圖打破這種簡單化的解讀，突出全球南方內部的矛盾和分歧。

在方法論上，本文結合概念批判、實證分析和獨立的批判性探究，避免預設的政治立場，並有意識地拒絕對國家敘事（無論來自中國、西方或其他國家）的不加批判的接受，而是將其視為更廣泛的話語和地緣政治景觀的一部分。通過審視全球南方話語中的預設，將其置於歷史和地緣政治背景之中，提供細緻入微且分析嚴謹的視角，以探討「全球南方」這一概念如何被建構、動員和爭奪。

下面我對全球南方的分析體現了一種新的世界秩序，這與國際關係學者阿查亞 (Amitav Acharya) 提出的「多重秩序」(multiplex order) 概念高度契合。阿查亞將多重秩序比作一座影院，容納了多種電影、演員、導演和劇情，彼此並行不悖。這一秩序呈現了去中心化與多元化特徵，其中包括區域組織、非國家行為體和中小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多重秩序的其他特徵還包括全球高等教育、經濟、貿易、金融，以及全球生產網絡和供應鏈的複雜、相互依存關係，這些均體現出其去中心化和多邊主義精神^⑤。事實上，擴展中的金磚國家框架正試圖避免「敵我對立」的二元對抗模式，強調包容性、重疊的成員關係以及集體領導。這也反映了全球南方在緩和大國競爭、堅持中立與包容方面的努力，拒絕任何單一國家的霸權。這種動態正是多重秩序的核心特徵之一。

二 「全球南方」的概念分析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一詞最早由美國政治活動家奧格爾斯比(Carl Oglesby)於1968年提出^⑥。近年來，眾多國際組織、西方各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開始接受並使用「全球南方」這一術語。中國尤其傾向於採用這一概念，這不僅與其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歷史身份有關，也與近年來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合作密切相關。相比之下，俄羅斯曾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儘管國際地位有所下降，仍然是世界主要大國，因此不願被歸類為全球南方國家。同樣，美國從未認為自己屬於全球南方。

從地理角度來看，「全球南方」並不是準確的術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雖然地處南半球，但由於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上與西方的結盟，它們屬於全球北方。相反，中國和印度儘管地處北半球，但由於其歷史上的殖民或半殖民經歷、發展軌迹以及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定位，被歸入全球南方。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全球南方」是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低收入經濟體或過時的「第三世界」等術語的廣義同義詞。儘管這些術語主要反映了全球經濟的等級體系，但「全球南方」的概念還承載着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含義，使其區別於單純的經濟分類。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率已從2000年的25%上升至2024年的45%以上^⑦。2023年，全球南方主導的金磚國家總GDP為全球生產總值的31.5%，超越了全球北方G7的生產總值(30.7%)^⑧。

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全球南方涵蓋了曾經被殖民或半殖民的、如今已獲得獨立的國家。這是一個地緣政治的隱喻，成為一種反對全球北方的話語建構。這一術語在冷戰後尤為重要，因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即「三個世界」^⑨)的傳統分類已失去意義。

儘管「全球南方」的概念最初源自西方，但中國已戰略性地採用並利用這一概念，從而帶來以下幾個主要優勢：第一，靈活性強，避免意識形態對抗。舒曼認為，中國在政治上使用「全球南方」這一術語，意在培育和推動一場反美運動。然而，北京政府明顯避免援引世界社會主義或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因為這些框架過於對抗性。相反，「全球南方」這一概念更具包容性，涵蓋了包括部分美國盟友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因此，北京政府不可能在政治動員層面上使全球南方整體反美。該概念比較溫和，因而在新冷戰格局下具有減少對抗性的功能。北京大學教授查道炯認為，「『全球南方』明顯在竭力避免成為大國地緣政治競爭的角力場，今後也有理由避免世界再現集團式對抗的局面」^⑩。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化議程是隱性的，使得中國能夠在戰略上淡化這一議題，避免了直接與西方對抗，在需要時又具有調動反殖民主義情緒的可能性和能力。

第二，提供外交和經濟緩衝區，助力中國應對地緣競爭。面對中美地緣競爭的加劇，「全球南方」概念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外交和經濟平台，以降低與西方國家完全脫鉤的風險。2023年，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首次超過對所有發達市場的出口，標誌着貿易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一趨勢在2024年持續，12月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同比增長了10.7%，主要受到這些地區基礎設施項目的推動^①。在這個背景下，這一概念可幫助中國調整貿易政策，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合作，為中美脫鉤提供替代市場。此外，全球南方框架支持了多極世界秩序 (multipolar world order)，削弱了西方主導地位，並推動了新興經濟體 (包括中國) 的全球影響力。

第三，進行政治動員和構建廣泛聯盟。中國對「全球南方」這一術語的運用在規模和政治動員方面具有獨特性。與其他國家將「全球南方」作為一種鬆散的修辭性用詞不同，該概念在中國被積極運用為政治工具，從中央政府的機構延伸至省市、大學和智庫都積極參與全球南方相關的專案。各種全球性項目，如媒體合作、可持續發展、數字化、全球公共領域、能源合作、跨境電力傳輸 (例如從老撾到新加坡) 等^②，都可以被歸入全球南方框架。這種自上而下的動員使「全球南方」從抽象概念轉變為政治行動和國際參與的具體框架。「全球南方」是一個包容性強的概念，可以容納不同領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倡議。正因如此，中國能夠利用全球南方進行政治動員，吸引廣泛的國際參與者，即使這些國家的利益不盡相同。

但是，「全球南方」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全球南方」是一個極其廣義和含混的概念，涵蓋了差異巨大、聯繫鬆散的國家，難以將這些國家作為統一的整體來看待。這一術語的靈活性雖然適用於政治動員，但也削弱了其作為分析工具的價值，容易導致泛泛而論和缺乏精準性。中國學者在討論全球南方時，經常在這個術語加上引號，進一步說明了這個術語的多種含義。

第二，這一術語包含了經濟邏輯與價值規範這兩個維度，可是兩者存在內在的矛盾。全球南方的經濟邏輯鼓勵南北合作，而價值規範則傾向於將其置於全球北方的對立面，提供了對抗西方主導秩序的地緣政治框架。在處理這個矛盾上，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新興大國在國際上使用反殖民主義話語，但在實際外交政策上，往往採取更加務實的立場，在意識形態對抗與經濟合作之間尋求平衡。

第三，儘管全球南方常被描述為一個統一的集團，但實際上缺乏政治和經濟上的內部一致性。國家利益、主權問題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使全球南方難以形成單一、協調一致的政治力量。因此，試圖將全球南方視為一個在全球政治中具有整體行動能力的實體，可能會導致過度簡化的結論。

第四，中美競爭促使中國使用和推動「全球南方」概念，但中國自身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地位使其難以完全歸屬於全球南方。「全球南方」這個術語傳統

上與發展中國家、低GDP水平相關聯，而中國已從邊緣地位 (peripheral) 進入半邊緣 (semi-peripheral)，如今正邁向世界體系的核心 (core)。這一趨勢使得中國未來是否仍能被繼續視為全球南方成員，變得日益複雜和充滿爭議。

三 全球南方的領導問題

美國和中國一般從大國競爭的視角來理解全球南方，競爭領導全球南方國家是其各自的戰略目標。大國競爭視角假設全球南方國家是被動的行動者，而美國或中國應是全球南方的領導中心。這個假設在現實中面臨各種挑戰，尤其是全球南方內部對領導地位的競爭。

如前所述，舒曼認為中方的戰略目標是建立全球南方國家聯盟，以對抗美國的全球聯盟體系，並作為推動中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利益的基礎。2023年8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 (Kurt M. Campbell) 在國會敦促華盛頓加大在全球南方抗衡中國的力度，警告稱美國在非洲等地的影響力遠遠落後於中國，可能面臨在獲取關鍵礦產等方面的失敗風險。他還呼籲盡快批准積壓的大使提名，以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的接觸^⑬。美國戰略家認為全球南方正逐步獲得戰略自主權，應成為美國優先爭取的合作夥伴；巴西、印尼等關鍵「搖擺國家」是國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美國需特別關注；面對全球南方內部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多元化，美國應制定差異化和精細化政策，而非「一刀切」策略^⑭。

但是，美國有先天性的缺陷：它不是全球南方的當然成員。此外，美國的戰略目標與全球南方國家不同，很難成為全球南方的天然領導者。特別是現屆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政府對全球南方的態度表現出對抗性。2024年12月，特朗普威脅要對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等金磚國家徵收100%關稅，以阻止這些國家推動去美元化進程。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削減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 資助的項目，終止了90%的合同。這一決定對全球衛生和人道主義援助項目造成嚴重影響，尤其是在非洲國家 (如南非) 和海地，導致愛滋病治療和孕產婦健康服務中斷。特朗普還提出了一些有爭議的領土擴張主張，例如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⑮。總體來看，特朗普政府的對抗性策略，重點包括經濟施壓、削減援助以及領土擴張，這些舉措已加劇了美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緊張關係。

比較而言，中方強調，「中國始終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是發展中國家可靠的、長期的合作夥伴，也是全球發展的積極貢獻者」^⑯。對於中國而言，確立自己作為全球南方領導者的地位不僅具有象徵意義，而且涉及全球秩序變遷的更廣泛問題——誰將引導國際結構的變革？中國在全球南方的領導地位往往被塑造為對歷史上的國家關係不平等的糾正，並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

然而，中國在全球南方的領導角色既複雜又充滿爭議。中國官方表述中並未直接提出全球南方領導力，只是說「我們要做維護和平的穩定力量」，「我們要做共同發展的中堅力量」，「我們要做文明互鑒的促進力量」^⑩。實際上，領導力不僅僅是政治宣示，還涉及重大的財政承諾（包括投資、促進貿易）和外交投入。中國能否完全承擔這一領導角色仍受其財政限制和國內經濟壓力的制約。此外，領導力還受到其知識體系和智庫結構的影響。中國的智庫成員主要由國內學者和實際部門人員主導，較少吸納西方學者和海外華人。這一點與西方智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往往融合更加多元、跨文化的專業成員及其視角。中國智庫的相對封閉性，可能會限制其在全球南方內部建立真正包容性夥伴關係的領導能力。

全球南方內部有多個競爭者試圖成為領導之一，每個國家都提出了不同的全球治理和合作願景。巴西將自己定位為現有全球秩序的挑戰者，宣導結構性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巴西總統達席爾瓦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在2024年聯合國COP30峰會上支持建立常設的「全球公民大會」(Permanent Global Citizens' Assembly)，並承諾由巴西政府提供資金支援^⑪。這一倡議體現了巴西在全球治理層面推動「參與式治理」的承諾，旨在確保全球南方的聲音在國際決策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印度試圖通過召集全球南方國家來鞏固其影響力。2024年1月6日，印度主辦了第三屆「全球南方之聲峰會」。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D. Modi) 提出了「全民參與、全民發展、全民信任與全民努力」的願景，以及「世界一家」的理念，意即「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家庭，同一個未來」^⑫。南非則宣導另一種領導模式，以「烏班圖」(Ubuntu) 理念作為全球協商機構的基礎原則。烏班圖源於祖魯族和科薩族傳統，強調集體協商和相互依存。南非總統拉馬福薩 (Cyril Ramaphosa) 在金磚國家—非洲外展會議及「金磚+」對話上的講話中提出了這一概念，並賦予其新的更具實用性的含義。在這一闡釋下，烏班圖不僅是哲學概念，更成為南非在金磚國家外展會議中的指導原則^⑬。

由誰來領導全球南方的問題挑戰了由單一大國來領導全球南方這一觀點。誰——如果有的話——能代表和領導全球南方這一問題似乎與全球南方的本質相矛盾。全球南方的領導問題不應該被理解為「權力支配」(power over)，而應該被視為「賦權過程」(empowerment)。一種多元領導模式正在形成，各國根據自身優勢提出不同的理念和舉措。巴西推動參與式治理，印度希望塑造外交網絡，南非推廣協商框架。問題在於，這些不同的努力能否最終融合為一個統一的願景，還是會因治理觀點分歧而保持分散狀態？全球南方領導地位競爭的動態表明，全球南方國家具有能動性。在這一背景下，領導力並不意味着排他性的霸權，而是促進一種超越傳統權力等級的集體領導形式。因此，全球南方並不需要單一的領導者或主導力量，關鍵在於如何以共用和合作的方式培養並行使集體領導力。全球南方領導力將如何發展，仍有待觀察。

四 全球南方的能動性與槓桿作用

如前所述，大國競爭視角將全球南方國家簡化為美國或中國領導下的接受者或適應者。這一假設存在嚴重缺陷，因為它忽視了這些國家在面對中美競爭時所展現的自主性、能動性和戰略槓桿作用。小國亦可獲取影響力並實現其國際政治目標，關鍵在於其與多元化的權力發展之間存在緊密聯繫^②。

全球南方國家已經在中美競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過保持不結盟立場，全球南方國家可以避免被捲入中美的直接衝突，維護其自身利益。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島國不認同美國的新冷戰框架，強調多元而相互依賴的世界，反對選邊，保持中立。舒曼也認識到這一點：「試圖說服全球南方反華，可能會像北京試圖讓全球南方反美的新舉措一樣適得其反。」^③

全球南方國家積極參與多邊組織，為自己締造一個放大聲音、維護自身利益的平台。對於中小國家來說，它們在與中國或美國的雙邊談判中往往處於弱勢，因此更傾向於通過區域聯盟來增強自身的集體影響力。例如，在非洲，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和東非共同體（EAC）等區域經濟組織，正試圖通過集體談判來制定貿易條款，而非依賴單個國家單獨與外部經濟體進行博弈。類似地，在拉美和東南亞，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與東盟等地區組織的出現，表明區域經濟與政治合作正在成為全球南方國家在多極世界中尋求自主權的重要方式。

東盟成功地在中國與美國之間斡旋，將自身塑造為地區安全與經濟對話的核心力量。這種策略幫助其從中美兩國爭取貿易協定與獲得投資，同時在地區事務中保持一定自主權。2023年東盟消除區域內部貿易壁壘，並吸引大量外資，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達到2,26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④。在2024年8月26日於泰國武里南舉行的第七屆東亞峰會教育部長會議上，東盟獲得澳大利亞東盟獎學金計劃的持續支持，以推進「東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和「東盟數位化轉型與未來技能計劃」（Aus4ASE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uture Skills Initiative）等項目^⑤。同時，美國每年向東南亞提供超過7,000萬美元的教育與文化交流資金^⑥。此外，東盟也獲得中國的資金支援，以促進和實施「東盟—中國青年領袖獎學金計劃」、「東盟—中國教育合作周」，並將2024年定為「東盟—中國人文交流年」^⑦。

大國要贏得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就必須給出優惠的條款。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南方國家通過平衡與大國之間的關係，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並通過談判獲取有利的貿易協定、技術轉讓和投資。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與中國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不少全球南方國家在技術和教育領域也加強了與美國的合作，從而實現國際關係的多元化。此外，這些國家可以通過突出自身的獨特資源和地理優勢來爭取更有利的條件。例如，非洲許多國家成功吸引了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儘管這些投資備受批評，但確實促進了當地

經濟發展和互聯互通，鐵路和公路的建設往往帶動當地商業活動和區域貿易的增長。

當然，我們也不能誇大全球南方國家在面對中美競爭時所展現的自主性、能動性和戰略槓桿作用。這種自主性、能動性依賴於國內政治的鬥爭、領導人的能力和智慧。中小國家可以通過地區組織擴大其聲音，但是集體力量形成的過程會遇到各種阻力。

五 滲透性制度化的全球南方

舒曼聲稱：「習近平現在正試圖將這些〔全球南方〕國家的領導人納入其反美運動。這一議程在金磚國家這一發展中國家所組成的集團的進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²⁸然而，這種解讀過於簡單化，並且曲解了全球南方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進程。金磚國家框架確實是全球南方制度化平台之一，但是這個平台具有滲透性和包容性，反美運動並非全球南方的制度化的本質屬性。

全球南方的制度化並非針對美國的反應性結盟，而是一個複雜且不斷演變的過程，受到歷史遺產、經濟需求和多元政治訴求的共同影響。金磚國家並非一個服從於中國領導的單一集團，每個成員國都有其戰略考量，都在該機制內追求自身利益。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國在金磚國家框架內與中國互動，並非作為反美聯盟的被動追隨者，而是尋求利用多邊組織來實現自身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主動參與者。

此外，將全球南方的制度化簡化為中國與美國競爭的延伸，無視了相關國家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金磚國家擴展及其他全球南方倡議的推進，源於發展中國家更廣泛的願望，即重塑長期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儘管中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全球南方的制度化不能僅通過中美大國競爭的視角來理解。相反，它必須被視為一個多維的和多主體的過程，反映全球南方各國在國際舞台上尋求更大自主權、經濟合作和政治影響力的共同願景。

全球南方的制度化是開放而非封閉的，反映了其成員國在戰略利益和國際關係上的多樣性。目前，二十國集團 (G20) 由於包含 G7 成員，不適合作為全球南方的平台，而上海合作組織由於地理局限性，難以形成廣泛機制。因此，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成員的七十七國集團 (G77) 和金磚國家成為了當前全球南方最具實質性的合作機制和制度。中國長期支持 G77 的宗旨和原則，以觀察員身份出席該集團部長級會議，並在多個國際場合與其保持一致立場。1991 年，中國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籌備會上首次與 G77 共同提出立場文件，正式形成了「G77+中國」合作模式²⁹。在這些機制中，金磚國家已成為全球南方制度化的重要支柱，不僅象徵着新興大國之間的合作，也作為構建對抗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的平衡性機制³⁰。前述 2024 年 10 月在喀山舉行的金磚

國家領導人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國家加入金磚事業」^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秀軍也指出，「大金磚合作」的時代價值日益凸顯，金磚國家將在增強全球南方話語權、提升其影響力和推動機制化方面發揮更大作用^㉑。

然而，全球南方的制度化是滲透性的，而非排他性的。與封閉的聯盟不同，加入全球南方的制度化機制並不意味着與其他國際體系割裂。例如，印尼於2025年1月正式加入金磚國家，同時也在尋求加入屬於全球北方體系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與此同時，作為金磚國家核心成員之一的印度也在積極深化與美國的安全夥伴關係，展現了全球南方國家在地緣政治上的多重歸屬。

這一滲透性制度化現象表明，全球南方的「大金磚合作」並非一個對抗全球北方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的集團，全球南方更傾向於通過靈活的開放式合作機制運作，以適應各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例如聯合國的「南南合作」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致力於解決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面臨的挑戰，包括貧困、人口增長、武裝衝突、公共健康危機和邊界爭端。儘管金磚國家和G77為全球南方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其成員國在國際舞台上的選擇和立場並不總是完全一致。因此，這種靈活性究竟能增強全球南方的整體影響力，還是會削弱其集體談判能力，仍有待觀察。這也取決於全球南方國家如何緩解其內部張力，以確保全球南方作為一個整體崛起，而不僅僅是個別國家的崛起^㉒。

六 群體政治的建構與瓦解

事實上，上述全球南方的制度建設也引導我們懷疑全球南方國家的「群體政治」(group politics)的假設，即中國有計劃組織動員全球南方國家，全球南方政治身份被塑造、維持來反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個二元框架將世界政治劃分為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然而這種簡單的兩分法存在很多問題。由此，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提出了「全球南方」、「全球北方」和「全球東方」的分類，其中全球東方包括俄羅斯和中國。這一新的「三個世界」分類將中國從全球南方中分離出來，並將其與俄羅斯歸為全球東方^㉓。但是，這個分類依然假設了一種群體政治。

回顧歷史上不同形式的群體劃分，我們可以發現，群體分類體系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流動的、有限的，甚至往往會面臨瓦解的風險。在十九世紀，世界政治主要圍繞階級鬥爭展開。社會主義運動強調全球分化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並主張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對抗資產階級。然而，歷史的發展暴露了這種劃分的內在缺陷。當第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工人階級並未表現出跨國界的統一性；相反，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了階級團結。此外，工人階級內部的種族矛盾也削弱了階級認同。例如，當中國礦工在澳大利亞勞工市場與白人工人競爭時，白人工人對華工產生敵意，導致種族歧視的加劇，而非階級團結的形成。

進入二十世紀初，全球政治的劃分方式逐漸轉向種族分類。世界政治被愈來愈多地按照種族區分為白種人、黃種人和黑人，並由此衍生出各種排他性的政策、種族隔離和等級制度。這種種族化的世界觀助長了極端意識形態的發展，例如希特勒(Aldof Hitler)屠殺猶太人的政策。但是，一戰卻見證了白種人之間的殘酷廝殺，這本身就暴露了以種族分類進行政治動員的局限性。此外，各種種族政治主張，如以黑人為基礎的泛非洲主義，以黃種人為基礎的泛亞洲主義等，多以失敗告終^④。

冷戰時期，全球政治的劃分又以意識形態為基礎，世界被劃分為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然而，這種二元對立的模式同樣遭遇挑戰。一方面，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借鑒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另一方面，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則採用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政策，如發展福利制度。可見意識形態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具有相當的滲透性和流動性。

以上三個例子說明，每一種全球性的群體分類方式，最終都會受到內部矛盾的衝擊，並在某種程度上走向瓦解。由此衍生出一個深刻的問題：全球南方的群體政治是否也會遇到類似的命運？雖然全球南方提供了一種基於經濟發展水平和殖民歷史的共同身份認同，但這一政治框架的穩定性仍然存在巨大不確定性。

作為一種全球政治動員工具，「全球南方」這一概念被假定為：所有經歷過殖民或半殖民統治的國家，在當代全球事務中必然持有一致的反對全球北方的政治立場。然而，全球南方國家在後殖民時期的發展路徑因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戰略、區域動態和安全考量等因素而產生巨大分歧，共有的殖民歷史並不必然促成對全球北方(如美國)的統一反抗。菲律賓儘管曾先後經歷西班牙和美國的殖民統治，但卻與美國建立了牢固的聯盟，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中與美方保持一致。同樣，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前殖民地國家在外交政策上也各自採取獨立路線，無法構建一個具有共同議程的全球南方聯盟。這些差異無疑削弱了構建一個連貫且政治統一的全球南方集團的努力。

況且，美國與全球南方的多個國家仍保持正式或非正式的軍事聯盟。哥倫比亞成為首個也是唯一一個獲得北約(NATO)「全球夥伴」地位的拉美國家，突顯了美國主導的安全框架超越傳統聯盟模式的擴展趨勢。菲律賓和泰國等國與美國簽訂了正式的防務條約，強化了其戰略軍事聯繫。印度雖非美國的正式盟友，但被指定為「主要防務夥伴」(Major Defense Partner)，並在四方安全對話(QUAD)中發揮關鍵作用，該機制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組成，旨在強化安全合作。同樣，巴西被授予「主要非北約盟國」(MNNA)地

位，使其能夠享有特定的國防和安全合作利益。儘管南非未被授予相同地位，但作為美國在非洲的重要經濟和戰略夥伴，兩國關係同樣密切。粗略估計，全球南方中約有十五至二十個國家可以被歸類為美國的盟友或緊密夥伴。當然，這一數字會因不同的分類標準、安全協議以及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而有所變動。但是，這些重疊的夥伴關係挑戰了全球陣營的二元劃分，並展現了全球南方國家在與大國交往時的複雜性。這進一步引導我們懷疑全球南方的集體共同認同和團結的假設。

七 全球南方的集體認同

中國把全球南方打造為反美同盟這種觀點，似乎假設了全球南方國家之間存在一種統一的集體認同。然而，這種集體認同既不是單一的，也並非沒有內部張力。雖然共同的殖民歷史和經濟發展困境構成了全球南方的合作基礎，但全球南方內部的經濟不平衡和貿易關係的不對稱性也暴露出其內部分歧。例如，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逆差以及中國與非洲之間的不對等經濟關係^⑤，揭示了全球南方國家之間存在結構性經濟失衡。由於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一些非洲國家正在尋求加強地區組織，以促進非洲內部的貿易合作，並減少對外部經濟體的依賴^⑥。

此外，「全球南方」這一概念本身可能掩蓋了內部深層次的差異與矛盾。從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到意識形態立場，全球南方內部的多樣性遠遠超出了表面的統一性。正如歷史所揭示的，大概念下的群體身份認同往往會隱藏內部矛盾，但這些矛盾可能會持續積累，最終導致某一群體的解體。如果全球南方要成為一股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就必須正視並協調其內部分歧，而不能僅僅依賴一種抽象而脆弱的團結感。否則，它可能會像前面提到的階級或種族群體政治一樣，在內部分裂的衝擊下逐漸解體。

當代全球政治受貿易關係、安全同盟和意識形態等複雜關係的影響，已超越了單純的殖民歷史。儘管歷史上的不義仍然是重要原因，但它並非單一決定因素，不足以主導全球南方國家當前的外交選擇。因此，儘管全球南方是經濟與發展領域中的重要分析範疇，但它在政治動員方面的作用則受到具體歷史、區域和戰略背景的高度制約。歸根結底，全球南方作為一個統一、整體的想像，既是戰略性的建構，也是充滿矛盾的現實。儘管歷史敘事和共同的發展訴求奠定了全球南方的基礎，但經濟差距、地緣政治競爭以及各國不同的國家利益，使得全球南方的內部凝聚力量面臨挑戰。

的確，在多極世界的框架下，許多曾是殖民地的國家傾向於拒絕西方的主導權。以全球南方高等教育的區域化趨勢為例，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去殖民化的一種方式，旨在挑戰西方在全球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長期主導地位^⑦。儘管高等教育區域化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反殖民因素，創建反霸權空間，並通過

區域化重新構想教育體系³⁸，但是去殖民化話語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維度：混合型或開放式多重秩序的出現。

東盟是混合型或開放式區域主義的典型例證。例如，前述在2024年8月於泰國舉行的東亞峰會教育部長會議上，不僅有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參與，還包括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太平洋國家。東盟的這種戰略平衡了美國和中國的影響力，同時與歐盟保持緊密的可持續的高等教育合作。又如，印尼明確表示希望借鑒歐盟的「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³⁹。在全球背景下，西方高等教育仍然保持重要影響力，而亞洲高等教育正在經歷深刻的質變和增長，西方與非西方體系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已無法簡單地用「中心—邊緣」模式來解釋。如果僅將區域化高等教育框架視為對外部勢力的抵抗模式，那麼全球高等教育將不可避免地分裂為相互對立的集團⁴⁰。

八 結論：「全球南方」概念何時以及如何消失？

隨着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急速變化，「全球南方」這一概念的有效性正面臨挑戰。我們需要思考：「全球南方」何時以及如何失去其意義？

韓國曾經被列入全球南方⁴¹，現在很難視之為全球南方國家，可見經濟水平的變動會導致國家分類的變化。未來「全球南方」概念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變化。目前中國仍然自我認同為全球南方的一員，強調其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並利用這一概念加強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聯繫和團結。然而在未來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軌跡將使其更穩固地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隨着GDP的持續增長和全球影響力的擴大，一個關鍵問題浮現：中國還能被視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國仍以發展中國家自居的做法正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2023年6月8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通過了所謂的《終止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法案》(Ending China's Developing Nation Status Act)，要求國務卿在美國參與的國際組織中剝奪中國享有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歸根結底，美國的目標是試圖排除中國作為全球南方成員的身份。這場博弈不僅將由美國繼續推動，未來當全球南方內部緊張關係加劇時，全球南方國家也將參與其中。

此外，「全球南方」概念的濫用可能導致心理疲勞。在學術、媒體和政策討論中，「全球南方」一詞的頻繁使用，可能會使其變成一個空洞的符號，涵蓋範圍過廣，以至於失去清晰的定義。在國際關係領域，該術語已經被擴展到包含經濟發展水平、地緣政治立場差異巨大的國家，使其實際應用愈來愈難以捉摸。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的內部分裂、經濟轉型和地緣政治變革可能會加速這一概念的衰落，最終使其演變為一個過時的、支離破碎的政治術語。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具有共同利益的觀點忽略了它們之間巨大的結構性差異。貿易糾紛、債務問題以及地緣政治重組可能進一步加劇這一分

裂。例如，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關係曾經被視為互惠合作，但是債務可持續性問題、貿易失衡以及產業競爭將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和批評。隨着這些矛盾的升級，一些全球南方國家可能將中國視為經濟競爭對手，甚至是一種新的霸權勢力。這種內部裂痕將進一步削弱全球南方作為一個統一政治經濟實體的合理性。

如果「全球南方」概念逐漸失去價值，其影響將是深遠的。國際政治不再僅僅以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二元對立框架來看待，而是更加流動和分散。中國和印度等國可能會愈來愈難以繼續享受發展中國家身份帶來的某些特權，從而影響它們在貿易談判、氣候變化談判以及發展援助政策中的話語權，因為它們將逐漸被視為新興大國而非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的衰落可能促使各國將更多精力投入基於具體利益的務實合作，而不是僅僅依賴歷史或意識形態上的團結。國家之間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會超越全球南方的框架，產生更加靈活的國際合作模式。聯合國、世界銀行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等全球機構可能需要重新考慮如何分類和支持發展中國家，並以更具功能性的新分類方法取而代之，例如基於收入水平、經濟結構或區域動態進行劃分，而不是使用廣義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全球南方」概念。儘管「全球南方」目前仍是一個強有力的概念，但其長期存續並非必然。

註釋

①⑥⑦⑧ 〈習近平在「金磚+」領導人對話會上的講話〉(2024年10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www.mfa.gov.cn/web/zyxw/202410/t20241024_11515585.shtml。

② Michael Schuman, "Xi Wants to Enlist the Global South in His Anti-American Movement", *New Atlanticist*, 29 August 2024, 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xi-wants-to-enlist-the-global-south-in-his-anti-american-movement. 舒曼是一位自1996年以來一直在亞洲生活和工作的記者，目前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彭博觀點」(Bloomberg Opinion)的撰稿人，曾為《時代周刊》(*Time*)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撰寫文章。他的最新著作是 *Superpower Interrupted: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20)。

③ 查道炯：〈「全球南方」不應成為地緣政治角力場〉，《環球時報》，2023年8月12日，第7版；〈「全球南方」能被武器化？〉，《環球時報》，2024年3月12日，第14版。

④ 陳子帥、黃培昭、姜宣：〈中國，推動「全球南方」發展振興的中堅力量〉，《環球時報》，2024年11月29日，第7版。

⑤ Amitav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31, no. 3 (2017): 271-85.

⑥ Carl Oglesby, "Businessmen's International", *New Left Notes*, 12 August 1968, 4.

⑦ "Global Economy Stabilizes, But Developing Economies Face Tougher Slog" (16 January 2025),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5/01/16/gep-january-2025-press-release.

- ⑧ “BRICS Countries Overtake the G7 in Share of World GDP” (12 March 2023), www.algora.com/Algora_blog/2023/03/12/brics-countries-overtake-the-g7-in-share-of-world-gdp.
- ⑨ 毛澤東：〈關於第三世界劃分問題〉（1974年2月22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600-601。
- ⑩ 查道炯：〈「全球南方」不應成為地緣政治角力場〉，第7版。
- ⑪ David P. Goldman, “China Continues to Shift Exports to Global South”, *Asia Times*, 14 January 2025, <https://asiatimes.com/2025/01/china-continues-to-shift-exports-to-global-south>.
- ⑫ 宋憲坤、史安斌：〈「全球南方」國家媒體發展與合作探析〉，《國際傳播》，2024年第4期，頁1-12；于鵬、張久琴、付麗：〈「全球南方」可持續發展與中非合作〉，《中國外資》，2024年第19期，頁36-39；蘆思姮：〈全球南方彌合數字鴻溝的現實邏輯與實踐理性〉，《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8期，頁76-95；周如南、吳德異：〈「全球南方」的可見性需求：一個「全球公共領域」的思考〉，《南方傳媒研究》，2024年第5期，頁43-53；徐悅、黎嵐：〈助全球南方破解電荒，中國可有更大作為〉，《世界知識》，2024年第22期，頁59-61。
- ⑬ Robert Delaney, “Washington Must Prioritise Matching China’s Presence in Global South, a Top US Envoy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July 2024, 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272546/washington-must-prioritise-matching-chinas-presence-global-south-top-us-envoy-says.
- ⑭ 趙建偉：〈美國戰略家如何認識「全球南方」〉（2024年12月26日），中國日報網，<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412/26/WS676d5f60a310b59111dab17f.html>。
- ⑮ Kailey Tracy, “Trump Renames the Gulf of Mexico the ‘Gulf of America’” (21 January 2025), www.fox13news.com/news/trump-renames-gulf-mexico-gulf-america.
- ⑯ Rich Wilson and David Levaï, “How a New Global Citizens’ Assembly Can Revive Climate Action” (18 February 2025), www.democracywithoutborders.org/34972/how-a-new-global-citizens-assembly-can-revive-climate-action.
- ⑰ “3rd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 2024” (16 August 2024), www.indiaties.in/24717/3rd-voice-of-global-south-summit-2024.
- ⑱ “Welcome Remarks by BRICS Chair, President Cyril Ramaphosa, at the BRICS-Africa Outreach and BRICS Plus Dialogue” (24 August 2023), <https://dirco.gov.za/welcome-remarks-by-brics-chair-president-cyril-ramaphosa-at-the-brics-africa-outreach-and-brics-plus-dialogue-24-august-2023>.
- ⑲ Tom Long, “Small States, Great Power? Gaining Influence through Intrinsic, Derivative, and Collective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 no. 2 (2017): 185-205. 另可參見 Raihaamana Tevahitua, “Where East and West Mee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 April 2025, <https://doi.org/10.1080/10357718.2025.2490652>, 1-9。
- ⑳ Michael Schuman, “Xi Wants to Enlist the Global South in His Anti-American Movement”。
- ㉑ Sunil Kaushal, “Why the World Is Excited about ASEAN” (4 December 2024), www.sc.com/en/news/corporate-investment-banking/whytheworldisexcitedaboutasean.
- ㉒ Veren S. Wanta, Novriest U. W. Nau, and Roberto O. C. Seba,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Mechanism in Achieving Regional Stability in Aus4ASEAN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eligious Understanding* 10, no. 8 (2023): 106, 109.

⑳ 〈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東盟特別峰會〉(2022年5月12日), 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網,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fact-sheet-u-s-asean-special-summit-in-washington-dc-zh>。

㉑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venth ASEAN Plus Three Education Ministers Meeting” (26 August 2024), 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4/10/FINAL_7th-APT-EMM-Joint-Statement.pdf.

㉒ 〈中國同七十七國集團的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 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326/zghgzz_682330。

㉓ Marek Rewizorski, “Governance as a Framework for Global Deliberative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BRICS and Emerging Global South”,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Yearbook* 53, no. 4 (2024): 186.

㉔ 徐秀軍: 〈「大金磚合作」塑造「全球南方」新未來〉, 《當代世界》, 2024年第11期, 頁10-15。

㉕ 劉洋、李益斌: 〈「全球南方」如何突破群體性崛起困境?——基於國際共生理論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分析〉, 《太平洋學報》, 2024年第10期, 頁42-52。

㉖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0, no. 1 (2024): 121-38.

㉗ 參見 Baogang He, *Contested Ideas of Regionalism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7), chap. 2。

㉘ Pádraig Carmody, Ian Taylor, and Tim Zajontz, “China’s Spatial Fix and ‘Debt Diplomacy’ in Africa: Constraining Belt or Road t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56, no. 1 (2022): 57-77.

㉙ Oscar M. Otele, “China, Region-centric Infrastructure Drives and Regionalism in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7, no. 4 (2020): 511-32.

㉚ You Zhang,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iza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etween Decolonization, Recolonization, and Self-colon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29 August 2024,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24-01295-x>, 1-16.

㉛ Philip G., Altbach, “The University as Center and Periphery”,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82, no. 4 (1981): 600-21; Walter D. Mignolo,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and the Colonial Difference”,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1, no. 1 (2002): 57-96.

㉜ 「博洛尼亞進程」是歐洲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倡議, 旨在通過建立統一的學位體系和質量保障機制, 實現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兼容性與互認性。參見 Rahmad Hidayat, “The Fusion of the Bologna Proces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Indonesia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deas in the MBKM Policy”, *Journal of Governance and Local Politics* 6, no. 1 (2024): 11-24。

㉝ Kazuo Kuroda, “Reg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sia Pacific Higher Education*, ed. Christopher S. Collins et 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41-56.

㉞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London: Pan Books, 1980), 53, 120.